

天津蔡公馆与张学良及其他

张刃



张学良与赵一荻

从蔡公馆说起

蔡女士住在距天津市政府所在的原开滦矿务局大楼不远的泰安道一座小洋楼上，与当年蔡公馆所在的曲阜道不过一箭之遥。只是那建筑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损毁，早已拆除，荡然无存了。

蔡女士在姐妹中排行十二，虽已至耄耋之年，但精神很好，思路清晰，谈吐健旺，还不时夹杂英语，依然是大家闺秀风范。

话题自然从公馆说起。蔡公馆的主人、蔡女士的父亲蔡绍基，祖籍广东香山，生于1859年，13岁时作为中国首批公派赴美国留学30名幼童之一，与詹天佑是同学。耶鲁大学法律系毕业回国后，历任上海海关译员、袁世凯幕僚、直隶总督府北洋洋务总办等职。1894年，参与创办天津北洋大学堂，1907年，出任天津海关道兼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督办（校长）。后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辞去公职，退居在天津，转而办实业，是天津外国租界的第一位华人议员。1933年在天津去世。

那么，张学良如何与蔡家有了关联呢？蔡女士说，1924年，张学良第一次率东北军进关，住在天津，循当时社交惯例，到蔡家拜访蔡绍基，从此时相往来。“那时张学良才20岁出头，虽然身为司令官，却像个小孩子，蹦蹦跳跳，很爱玩。”蔡家十三妹（蔡淑珍）活泼可爱，有一双大眼睛，张学良学着天津话说：“你挺呱，早晚让你嫁到我们张家，嫁给我弟弟吧。”后来，张学良三弟学曾果然看上了蔡十三，二人于1931年结婚后去了美国，再没有回来。学曾供职于联合国直到退休，夫妇俩曾在香港庆祝金婚。如此说来，张学良与蔡家是姻亲。

说到于凤至，蔡女士笑笑，于初到天津时，“梳着纂，穿着大襟衣服，还抽大烟，显得很土。是我们姐妹教她各种时尚，才变得摩登了。我们家里用留声机教她跳舞，陪张学良跳舞则是到利顺德饭店或他家公馆。”后来张学良在天津认识的人多了，到蔡公馆也少了。

“我家从未办舞会”

说到跳舞，引出了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传闻，蔡女士断然否认：“张学良与赵四相识不在我家。我父亲虽然留洋回来，但我家还是半封建家庭，家规很严，子女每天要向长辈请安，晚间出门必须在12点以前回来。家里从来没有办过舞会，更不会请来洋鼓洋号吹吹打打。那都是后人瞎编的。”如此说来，蔡家不办舞会确在情理之中。

张学良是怎样认识赵四小姐的呢？蔡女士说，“我比赵四大三岁，与赵四的姐姐是同学，最早在卞家跳舞时见她，圆圆的脸，有雀斑，很爱笑，还是中西女中的学生，我们都把她当小妹妹看。她与张学良相识是在别的社交场合。”蔡女士这里说的卞家，指的是卞荣光，清末第三批留美学生，当时才9岁，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是同学，回国后在开滦煤矿任工程师，也是天津豪门。

张学良与赵四相识，比较可信的说法是，张学良的侍从副官朱海北是民国名人、曾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铃的儿子。朱家少爷、小姐众多，又喜交游豪门子弟，张学良便成为朱府的座上客。而赵四小姐与朱家兄妹有更早更深的关系，更是朱府的常客。张学良在朱府，便很快与赵四相识了。此外，张学良在天津资助的《北洋画报》风靡一时，主编便是赵四的大姐夫冯武越。由于这层关系，张学良与赵四的往来更密切了。1929年夏，张学良最疼爱的孩子、长得最像父亲的幼子阔琪（小三）病夭，张学良心境大坏。朱海北请来妹妹朱洛筠和她的同学赵四，陪伴张学良在北戴河度假，排遣烦恼。两人由此坠入爱河。当年，17岁的赵四便随张学良去了沈阳，从此相依为命终老。

张学良称谓种种

蔡女士提到的朱洛筠，是朱启铃的六女儿。九一八事变后马君武写诗

“骂”张学良沉于享乐不抵抗，名噪一时，其中有“赵四风流朱五狂”一句，“朱五”即朱洛筠的姐姐朱渭筠，后来嫁给了张学良的秘书朱光沐。朱洛筠比赵四大一岁，后来嫁给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两人成为妯娌，赵四也从“小妹”变成了“大嫂”，一时传为笑谈。

蔡女士还谈到张学良的老部下何世礼（曾任东北军驻葫芦岛司令，去台湾后官至上将，退役后到香港，其父是香港著名富豪、爵士何东）某年到天津来看蔡佩珍，曾问蔡：我去台湾，你有什么事吗？蔡说，问张学良好。

笔者注意到，蔡女士谈到张学良时都是直呼其名，遂问：人们不是都称他“少帅”吗？蔡女士说，我们相识很早，把他当作大哥哥，但从来没有叫过“少帅”。其实，张学良本人最讨厌这个称呼，觉得它和“衙内”差不多，会使人把他看作是倚仗父亲权势的人。这一点也被其他与张学良熟识者所证实。

事实上，张学良与家人、同僚之间，彼此称呼都很注意礼仪。他要求部下只称他不同时期的职务，如军团长、司令长官、副总司令；与大师张作霖称兄弟弟的张作相等父辈，或者蒋介石、宋美龄等则可呼其字“汉卿”，也有老部下称他“汉公”；于凤至、赵四小姐等家人称他“小爷”，而张学良的乳名“小六子”则只有张作霖夫妇敢叫。可见，影视剧里把“少帅”作为尊称呼张学良，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张学良寿诞琐闻

1990年6月，张学良九十寿辰宴会在台北圆山大饭店举行，宾客如云，盛况空前。这是张学良被幽禁54年来首次公开做寿，立即引起海内外极大关注。笔者几次趋访张学良在天津的侄子、张学良之子张学铭，希望了解更多内幕。

寿宴的发起者是张学良的老友、国民党元老张群。起初阻力很大，张学良遂劝张群作罢。张群说，你还有几个九十？我103岁了，此时不做寿，何时翻身？张群发了脾气，反对派不敢再阻

拦。寿宴发了280张请帖，台湾记者十分注意张学良在大陆亲友的举动。张鹏举说，我们没有接到请帖，不能不请自到。这是高兴的事儿，我们不能搅和。台湾方面邀请了在美国的张学曾，他说，大哥还是阶下囚，我不去。张学良唯一的女儿张闻瑛从美国飞赴台湾为父亲祝寿。

1991年春，张学良夫妇首次离开台湾赴美探亲，期间恰逢91岁生日。大陆亲友原准备在北京、西安、东北为之举办多种祝寿活动，张学良托人带口信，不希望如此张扬。他的老部下，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吕正操积极奔走，在邓颖超发出祝寿电后，88岁的他亲自赴美看望“老长官”。张学良特别邀请老朋友阎宝航之子阎明复赴美相聚，因故未能成行，遂请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写下“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张学良语）的条幅，请吕正操带给了张学良。

1998年，定居夏威夷的张学良过98岁生日，张鹏举偕夫人吴量绩飞往祝寿，此时张学铭已经去世15年。张鹏举第一次见伯父，按规矩双膝下跪连磕三个头，并送上张学良喜爱的京剧脸谱等寿礼。笔者曾问张鹏举：将军何时归故里？答曰：此事完全由我大伯自己决定。

2000年，张鹏举病逝。次年，张学良以101岁高龄驾鹤西行，与赵四小姐合葬于夏威夷神殿谷。

* * * * *

2014年，笔者到夏威夷旅游，专程拜谒了张学良夫妇墓，睹物思人，感慨万千。张学良是曾经改写中国现代史的传奇人物，35岁之前，叱咤风云；西安事变，震惊中外，此后被长期幽禁，九秩高龄才重获自由，其作为不能不令人敬佩，其命运不能不令人叹息。张学良晚年皈依基督，身后安息福地，从墓碑上的“复活在我”和“以马内利”题刻，人们似乎窥见了他的隐秘灵魂，触碰到他的皈依心境。然而，谁又能知道，他带走了多少历史秘密，留下了几许报国乡愁……

（作者系工人日报社原副总编辑）

以应付复杂局势情况下，1925年12月离职回上海，但史料上记载的是他任职期限止于1927年。

1925年12月胡敦复离职后，接任者是留法女博士郑毓秀校长。又来一位女校长，理应能够处理好师大内外事务。但郑博士是著名女革命家，她能够对戴洋、陆徵祥这样的人行刺，但对于像刘和珍这些学生则是束手无策。郑毓秀最终不堪女师大尴尬局面，于1926年初离职，去从事她得心应手的事情了。

随着时局的发展，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与可能了，1931年与北平师范大学合并，定名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即为现北京师范大学。

从一所大学的诞生，到校长的几经更替，不难看出其演变过程。这里面有真心实意的教育先驱，也有趋于仕途的政客，还有以改变社会为己任的政治家，这就很难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教育理念，其校长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不过，正是由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这短暂历史，为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提供了一所难得的教育机构，她不仅是当时中国最高女子学府，也是中国女子高等学校师资培养所，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早期职业教育的师资力量。

李大钊的警醒

周二中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李大钊1913年冬至1916年5月在日本留学，他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特点等进行了广泛的考察与研究，对日本的侵华野心、侵华罪行等有着深入了解。

李大钊认为，“武士道”与“大和魂”是当时日本的国粹、日本民族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加快自身发展、奋发图强上有好的一面，一旦表现为对外侵略扩张，这种精神就成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疯狂。李大钊明确指出，日本人“奴性最深，死抱‘忠君’二字，竟无觉醒之一日，可怜！”

近代以来，日本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灾难。李大钊痛心指出：“吾国对日关系之痛史，宜铭骨铭心，纪其深仇大辱者，有三事焉：曰甲午，曰甲辰，曰甲寅。”指的是1894年甲午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1914年日德战争，均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对于日本提出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一

条”，李大钊气愤地说：“此次日本提起交涉，全出于强盗乘火劫掠之行径，对于中国纯用迫胁威吓之术，对于世界各国，则取欺瞒诈骗之方，国际上不信不义之交涉，莫过于此也。”李大钊更是长远地看到，“二十一条”对于中国，将会“断绝根本复兴之生机，毁灭国家独立之体面，使我永无自存图强之实力”。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日本出现了“大亚细亚主义”思潮。李大钊洞悉其奸，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大亚细亚主义“不仅足以危害日本，并且可以危害亚细亚一切民族，危害全世界的和平”。

一切都被李大钊言中了，日本侵华时鼓吹的要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就是“大亚细亚主义”的现实版，结果只会掀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害了自己，貽笑天下。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胡适与申寿生的友谊

张雨

胡适在北大任教时与一个叫申寿生的人结下友谊。申寿生是贵州人，小胡适18岁。申寿生曾两次报考北大均落榜，后来做了北大一名不收学费的“偷听生”。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倡平民教育，坚持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因此北大“偷听”之风盛行。

胡适创办的政治新闻评论周刊《独立评论》面世后影响颇大，当时为该刊撰稿的都是名流学者。经济学家千家驹曾说：“能够在这个刊物上发表文章更有登龙门身价十倍之感。”

申寿生不顾自己的身份，他跃跃欲试要给《独立评论》撰稿。一次，他读了胡适的一篇谈“专制”的文章后，不同意胡适的观点，于是连夜写出一篇《试论专制问题》，谁料，此文竟发表在1934年1月的《独立评论》第86号上。

尔后，申寿生的写作便一发不可收，短短两年时间里在《独立评论》上竟然发表了13篇时论文章，在北大引起不小震动。

申寿生当时是以向《独立评论》主编胡适论战的姿态投稿的，胡适不但发表了他的文章，而且还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时传为佳话。

1935年1月23日，在广西师范专科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刘文典的借书单

崔鹤同

金克木年轻时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打零工。一次，图书馆进来一位穿旧长袍的先生，他夹着布包，手拿一张纸向借书台上一放，一言不发。金克木接过一看，是些古书名，后面写着为校注某书需要，请某馆长准予借出。

金克木请他稍候，自己快步跑到四楼借书库。库内老先生看了书单就皱眉，说这人不在北大教书，借的全是善本珍本，有的还指定抽借一册，而且借去一定不还。这怎么办？老先生想了一会儿，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并让金克木照此行事。

金克木下楼对借书者恭恭敬敬地说，这些书我们无权借出。现在某馆长已换了某主任，请你到办公室去找主任批下来才好出借。来人一听馆长换了新人，略微愣了一下，面无表情，仍旧一言不发，拿起书单，转身扬长而去。

金克木连忙抓张废纸，把借书单上的书名默写出来。怀着好奇和求知的欲望，以后有了空余的时间，便照单去找来看查。金克木很想知道，这些书中有什么奥妙值得那位老先生远道来借，这些并不相干的书之间有什么关系，对他正在校注的那部古书有什么用处。经过亲眼原书，又得到书库中人指点，金克木增加了对古书和版本的常识。

金克木后来成了北大教授，著名学者，著作等身。他曾对朋友说：“我真感谢这位我久仰大名的教授。他不远几十里从城外来给我用一张书单上的一堂无言之课。”

那位借书人就是刘文典，他的一张借书单，让一个好学青年大开眼界，求知的道路更加宽广敞亮，获益终生。由此也证明了刘文典学问的精深。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知多少

郭良正

同时，也忙于政坛仕途，次年兼职直隶提学使，后升迁北洋政府内閣教育总长。

傅增湘升迁后，无暇顾及学校具体事务，校长一职频繁交替。

举人出身且赴日留过学的毛邦伟，从1919年7月连任三任校长（其中一任为代理），任职期间顺风顺水，1922年顺利交到许寿裳手里。

许寿裳是鲁迅好朋友，对教育事业满腔热忱，就任伊始学校发展建设立竿见影，但眼见的政绩却得不到学生认可，这还不说，更得到学生送绰号的戏弄。这就让他感觉到还是一走为妙了。

辞职前，许寿裳思虑再三：大学名为女师，而每任校长都是男的，这是否有悖于“女子师范”之名。正好有一位两次远渡重洋并获得教育专业硕士的杨荫榆女士归国不久，成了许寿裳交接下任校长的首选。许寿裳辞

职时，推荐杨荫榆继任，并发出了“办女校最好是用女校长”的感言。

1924年2月，杨荫榆受教育部委任，接替许寿裳任女师大校长，也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校长。

杨荫榆办学理念秉承西方教育之风，管理风格过于严格保守，因几位学生不守校规被开除后，引起相当大不良反应。杨荫榆离开了岗位。

沸沸扬扬的“驱羊”运动后，当局下令停办女师大。这只是个手段，另成立国立女子大学，是女师大的延续，继续女师大的教学活动，为学生授课，这时校长是易培基。

易培基在任不长，又经过一阵折腾，胡敦复于1925年8月临危受命接任校长。这时女师大并非风平浪静，当校长与各方达成初步妥协后，才得以恢复女师大正常秩序。但终因当时北平并不太平，胡敦复始终未能取得与各方的共识，在难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曾因一次学潮、一篇纪念文章和一位饱受争议的女校长而名垂青史。

本文盘点了这所大学的历任校长。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创建于社会变革的多事之秋。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七月，御史黄瑞霖奏请清政府办学一事。得到清学部批复后，遂在石驸马大街（今新文化街）斗宫旧址建筑校舍，历时一年建成，达到招生初步条件。

藏书家、翰林院编修傅增湘出任第一任校长。傅增湘校长在抓教育的